

湖北房县出土摇钱树考

李 菲 (湖北省十堰市博物馆)

刘 斌 (湖北省房县博物馆)

摘要：摇钱树是我国汉代、三国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大多出土于四川盆地。位于鄂西北的房县为首次发现摇钱树，对于研究摇钱树的分布范围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房县；摇钱树；功能用途；分布范围

中图分类号：K87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4-0059-04

1976 年 12 月，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房县城郊高碑发掘了一座汉墓，时代为东汉，此墓为长方形砖室墓，在众多随葬品中有一件铜质摇钱树^[1]。此物大多出土于四川盆地与重庆三峡地区，为什么会出现于鄂西北地区？本文对其作了初步探析。

此株摇钱树整体形态呈树形（封三），出土时钱枝多已残断，仅余树干和部分枝叶与顶饰，未发现底座，通高 84 厘米。整个树体由青铜铸造而成，其中树体本身又由树干、树枝和顶饰三部分构成。其中部为圆柱体树干，共分为五段，都是由双范合铸分段铸造，榫卯结构拼接而成，其



图一 房县摇钱树顶饰



图二 房县摇钱树龙纹叶片

接节处有长方形孔隙，可将铜叶片插入树干接节处孔内连为一体。树的主干与枝叶共分为五层，五组枝叶分插在树干上孔内，每一组有四个叶片伸向四个方向。树的顶部饰有一猿猴站立在钱枝上（图一），作摇钱状。树叶浇铸扁平而较薄，图案为剪纸镂空效果，形状以方孔钱连续纹样，可以分为龙纹和凤纹样式。龙纹叶片为龙首昂扬作回首状（图二），其背上为锯齿状鬃，颌下有长须，龙口大张，口中衔有叶片，但多已残断。凤纹叶片主休为枝叶形状，其中长满了铜钱，但可以看出钱的方孔并不规范，枝叶的右侧有一只展翅的凤鸟，其外侧四周有芒刺。枝叶与树干连接处共计有五组人像浮雕纹饰，人像为高肉髻，身着通肩大衣，左手作无畏印，右手持大衣一角，目视前方，神态安详（图三）。人像两侧有枝叶组成的背屏，背屏四周有芒刺。

摇钱树是汉代、三国时期墓葬中的随葬明器，青铜铸造，由纹饰精美，图像丰富的神树和陶制、石制的树座所组成。因其树枝上挂满着中国古代流通的货币方孔圆钱，似乎只要摇动树杆，铜钱就会纷纷落地，所以被命名为摇钱树。这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对四川彭山汉墓发掘研究后，根据树座和树身上的图案判断而提出来的。20 世纪 60 年代于豪亮先生又提出了“钱树”这一称谓^[2]，为考古学界所接受。

摇钱树的地域特色，决定了它独特的文化内涵。查汉代以前的各种神话传说，均不见有树能结金钱的记载，可见即使有此传说也是从汉而起。摇钱树在我国出土数量据统计已有百件之多，主要出土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墓葬中，发现的地点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青海和湖北等数十个县市。其中又以绵阳、广汉和成都一带出土最多，是摇钱树流传的中心区域。罗二虎先生认为，摇钱树是当时益州刺史部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一种很具特征的器物^[3]。这些情况说明摇钱树是一种带有强烈区域性的文物类型，而其它周边地区出土的摇钱树，可以看作是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传播的结果。湖北地区也有出土，但多集中于峡江地区的秭归县一带，如1999年在秭归县台子湾东汉墓中，就曾出土一件较完整的摇钱树^[4]。以往学者对湖北地区发现摇钱树的地点，仅认为只在秭归峡江地区一带，而房县摇钱树的出土，打破了对以往对湖北分布地点的认识，将摇钱树在湖北地区分布地域由峡江向北扩展，由鄂西扩展到了鄂西北地区。今之房县所在地理位置，西与今重庆市毗邻，在西汉与东汉时期，房县与今重庆和四川部分地区同属益州刺史部^[5]，自古以来就与巴蜀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这种带有巴蜀地区文化色彩的摇钱树，在房县的东汉墓中发现，应该是合乎情理的事。本地区所发现的摇钱树仅此一例，器型较大且工艺精湛，推测墓主很可能是一位贵族阶层人士。

二

摇钱树始见于汉代，但决不是汉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产物，它与先秦文献中载述的神树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关于摇钱树上的钱，过去人们普遍将摇钱树与货币崇拜联系起来，认为摇钱树与历代墓葬中普遍随葬货币的习俗相近，体现出人们对货币的追求、占有欲，人们多将其作为终身追逐的目标，死后也要随葬到另一个世界去。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摇钱树这样一种既能助长生不老，又可随意获取钱财的神树应该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应出现于全国范围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摇钱树明显地局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也就是说，摇钱树上的钱并非只单纯的

表现人们对金钱的疯狂占有欲，而是还另有其它特殊的寓意。

房县出土的这件摇钱树，其树上所饰有猴、龙、凤与佛像。龙和凤经常用叶片的形式出现在摇钱树之上，房县的这棵也不例外。晋郭璞在《尔雅·释鸟》中对凤有着细致的描述，称凤的形狀为“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七尺许”。凤凰又被认为是神鸟，像征着大吉大利子孙昌盛，天下安宁国无灾祸。而龙在中国神话中是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众鳞虫之长，居四灵之首，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这株摇钱树上龙与凤的同时出现，应与当时的吉祥观念有关。

房县这株摇钱树的顶端，出现了手持树枝摇钱的猴。猴是我国西南地区常见的动物，灵敏机敏，极具灵性且容易与人亲近，很受古人的喜爱。其手持树枝摇钱的姿态，清楚地表明了钱树的功用，明确告诉人们是如何从钱树上取得财富的真实写照。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给这株摇钱树添加了活力与动感。而猴的使用，似还有深意，如羊字通祥，鹿字通禄，猴可通侯，巧妙的表达了墓主人封侯的美好寓意与期待。

经过仔细的观察与比较分析，可清楚地看到树杆上有数尊佛坐像，高肉髻、通肩大衣，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持大衣一角，从树干上所饰的佛坐像来看，其头顶上有高肉髻，这与汉式男子的头上戴冠或巾帻明显不同。而佛像唇部有小胡子，但下巴又未有须，汉人则上唇与下巴都有胡须，且下巴上胡须较长。佛像其左手施无畏印，这不同于当时汉人的习俗，《佛经》曰：“右手展掌，竖其五指，当肩向外，名施无畏”。佛教认为此印能施一切众生安乐无畏，这是只有佛教才会使用的手势。而树干上的佛像身着圆领通肩



图三 房县摇钱树杆佛像

大衣,似袈裟一般,而汉式着装则为右衽衣领与褒衣博带。种种迹象表明,佛像中的高肉髻、手施无畏印以及着装,这些佛教中最基本特征都具备了,可知这应是佛像无疑。其形象与印度、南亚的早期佛像相比较,其主要的特征更加接近于犍陀罗的早期佛像。东汉时期恰逢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将宗教观念融入于摇钱树之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揭示出东汉时期佛教已经在长江流域与西南地区流行,并广泛体现在摇钱树上。东汉时期,起源于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还占据着宗教信仰的主要位置,佛教还处于附庸状态,人们的宗教信仰往往是几种信仰的交糅,但是佛教信仰的影响在渐渐扩大。摇钱树上出现的佛像,并不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信佛,而仍然是寄托人们升仙的愿望,人们视佛为本地西王母一类的神灵而供奉,希望像佛一样飞仙升天。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以往在四川盆地出土的摇钱树上,也发现有同样的佛坐像,通过与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墓^[6],与忠县涂井崖墓^[7]所出土摇钱树相比较,其树杆上装饰的坐佛与房县这株相同,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与普遍性。东汉中期以后的很多摇钱树树干上铸有小型佛像,如此几乎是以同一思路 and 理念制作的带有佛像的摇钱树,在东汉、三国时广泛地分布于西南乃至西北地区。如此频繁而广泛地在摇钱树中发现佛教内容,背后必然蕴藏着中国与印度佛教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

房县这株摇钱树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其上并没有发现西王母的身影,这与四川盆地所出土较多带有西王母图案的摇钱树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现有出土的摇钱树材料来看,有些摇钱树上既有佛像图案也有西王母图案,有的学者称这种西王母与佛像共存于摇钱树上的现象,称之为“仙佛模式”,表现了佛教初入中国时候佛被中国民众当作仙界的神仙之一,而把佛与本土神仙共置于西王母仙境之中,正印证了这一时期所谓佛道杂糅的局面,完全不同于南北朝及以后纯正的佛教信仰。房县的这株摇钱树没有西王母图案,可能是由于佛教的渗入与发展,由佛像代替了本土神仙西王母在这株摇钱树上宗教功能,显示出了早期佛教对中国宗教与艺术的影响。

其树上既有宗教功能的佛像,也有吉祥用意

的龙、凤与猴,这一点也许满足了墓主人多种用意。那么这株摇钱树的用途与功能,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殉葬明器,并非只表现单纯的崇拜金钱的意图,有可能还是一件祭器,具有祭祀鬼神与天地的性质与功能,并以树的形式来表现,将此树作为与天地人神沟通的一种中介与载体,与早期商代三星堆神树崇拜亦不无关系,可见其文化内涵有着多元化的特点。

三

近年来,随着西南地区出土摇钱树的增多,学术界对摇钱树的研究也渐趋热烈。研究者们对摇钱树的形制、内涵以及主题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对于摇钱树属“树崇拜”的观点是一致的,“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信仰习俗,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人类生存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人的寿命非常短暂,而人类四周参天大树的生命力特别强,这正是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人们认为树之所以生命力极强,是因为树是神灵的栖息之所而受到神灵施加的影响所致,或者认为这些树木本身就是神灵,这种树崇拜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影响。1986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为东汉摇钱树的渊源找到了线索,都是“树崇拜”的珍贵遗物,房县出土的这件摇钱树也不例外,显然有其独特的意义。

首先从地理位置与出土分布地区上来说,其出土地点并不在发现较为集中的四川盆地,而在房县所属的汉水流域一线,扩大了摇钱树的分布范围,应是巴蜀文化与鄂西北地区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从文化内涵上来说,它与四川盆地所出土的摇钱树是一致的,其性质与用途相同,都系巴蜀文化向周边地区文化相互交流和传播的结果,为摇钱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佐证。周克林先生在《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一文中,在论述摇钱树内涵时,讲到了摇钱树也应与两汉时期的经济生活有很大关系,西南地区一直存在一条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路。周先生将其大致分为东、西、北三条线路:东线为成都——彭山——乐山——昭通——昆明——大理——保山——印度、缅甸;西线为成都——双流——新津——芦山——雅安——西昌,在昆明与 (下转 96 页)

八年”即公元 165 年,“明确纪年的汉代画像石棺的分期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标尺性样本,为我们深入研究川南地区的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4]。

结语

崖墓是四川地区及重庆、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制,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崖墓来看,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东起巫山、巫溪,西至汉源、昭觉,北抵广元,南达云南昭通、贵州遵义,东西约 750 公里,南北宽 550 公里的范围内。而以四川盆地中心地带最为密集,其中以岷江中下游、涪江中游三台和川南地区最为集中^[5]。

在泸州民间,将崖墓俗称“蛮子洞”。称谓之由来,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崖墓的随葬品、画像题材,都是汉文化系统。泸州在汉代就有建制,汉景帝六年(前 151 年)设置江阳县,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设泸州至清为州治,可见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泸州已完全汉化。在西南的川滇地区,崖墓出现大约在东汉初年,早不过西汉末年,东汉中期达到鼎盛,两晋时期逐渐走向衰退。

纵观泸州地区的崖墓及其葬具、葬品,既与四川地区同时期崖墓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其独特

之处。就墓室结构而言,规模不大,结构简单,几乎为单室墓。而沿岷江、涪江流域的墓葬有前庭、后室,或沿中轴线设置三室或多室等形制。泸州地区长江南北两岸出土的画像石棺题材也有略微的差别:长江北岸的画像石题材多表现现实生活,有较浓郁的民俗气息;而长江南岸的画像石题材多以神仙题材、孝文化为主。我们通过考察和分析崖墓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丧葬礼仪文化,还能透过墓葬的构筑形制及葬具、葬品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潮等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文中插图由卢引科、陈卓、邹西丹、白芮等绘制、拍摄,谨此致谢。)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泸州市博物馆:《四川泸州河口头汉代崖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6 年第 5 期。

[2] 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

[3]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 年第 1 期。

[4] 邹西丹:《泸州市石洞镇发现东汉“延熹八年”纪年画像石棺》。

[5]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第 222 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接 61 页)

东线南段相重合;北线为成都—新都—广汉—绵阳—广元—城固—西安^[8]。房县摇钱树的出土,说明两汉时期西南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线,除了上述三条线路外,是否还有沿长江东下通往汉水流域的一条路线呢?房县所在的十堰市汉水流域莲花池汉墓群曾发掘出土过巴文化典型的器物“双耳”铜釜^[9],这也证明了在两汉时期,本地区与四川盆地多有文化交流。

这件带有明显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在房县出现,可以说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对于进一步认识的摇钱树分布范围,以及对于巴蜀文化与汉水文化之间的演进与影响,还有民族宗教信仰,与佛教的发展等研究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注释:

[1] 湖北省房县博物馆资料。

[2] 于豪亮:《“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 年第 11 期。

[3] 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 年第 12 期。

[4]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编:《2003 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5]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2 年。

[6] 何志国等:《四川绵阳何家山 1 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 年第 3 期。

[7] 《四川忠县涂井崖墓》,《文物》1985 年第 7 期。

[8] 周克林:《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四川文物》1998 年第 4 期。

[9] 湖北省文物局主编:《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考古发现 I》,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 湖北房县出土摇钱树

